

东北亚研究

北方民族史研究

(三)

卢明辉 著

中州古籍出版社

东北亚研究

北方民族史研究(三)

卢明辉 著

中州古籍出版社

(豫)新登字 05 号

东北亚研究

——北方民族史研究(三)

卢明辉 著

责任编辑 穆 易

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发行 (郑州市农业路 73 号)

沈阳东亚研究中心印刷厂印刷

787×1092 毫米 16 开本 848.625 印张 19607 千字

1994 年 12 月第 1 版 1995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1—1000 套

ISBN7-5348-1363-8/K·456 定价:5400.00 元(全三十卷)

《东亚文库》编委会

主 编 孙进己
副 主 编 黄凤岐 冯永谦 干志耿 苏天钧
李昌仁 朝 鲁 刘永智 穆鸿利
常务副主编 冯永谦
编 委 (按姓氏笔划为序)
干志耿 于国华 王 雷 王宏刚 王革生 王绵厚
卢明辉 冯永谦 冯季昌 冯继钦 孙 泓 孙 海
孙进己 孙秀仁 齐 心 朱国忱 刘永智 苏天钧
吴文衍 李之勤 李昌仁 李英魁 李逸友 李殿福
张志立 张泰湘 高书全 崔 灿 孟广耀 周伟洲
郑绍宗 黄凤岐 朝 鲁 秦洪祥 蒋秀松 魏国忠
魏福祥 穆鸿利 潘喜廷
编辑部主任 孙 海
编 辑 孙 泓 张志立 张玉虹 张 岩

《东北亚研究》编委会

主 编 孙进己
副 主 编 冯永谦 黄凤岐
编 委 (按姓氏笔划为序)
干志耿 冯永谦 卢明辉 刘永智 乔成果 孙进己
刘远图 李之勤 苏天钧 李殿福 金 岳 孟广耀
朴成昊 周伟洲 郑绍宗 张泰湘 秦洪祥 崔 灿
黄凤岐 蒋秀松 潘喜廷 魏国忠

《东北亚研究》总序

东北亚目前包括六个国家和地区：蒙古、朝鲜、韩国、日本及俄罗斯的远东、西伯利亚地区和中国东部和北部地区。在这些国家和地区中，中国东北部地区占有重要地位。因为它正处于东北亚各国的中心位置，它东和北邻俄罗斯，西邻蒙古，南接朝鲜，隔海与韩国、日本相望。由于它的地理位置，它自然地应该成为东北亚各国交往的枢纽。在历史上，中国也曾起过这样的作用。汉唐以来，中国长期是东北亚经济文化最先进的国家，东北亚各国间的交流长期是以中国为中心，呈幅射状态。长期以来，中国的经济文化积极影响着东北亚各族经济、文化的发展。当时中国也是对东北亚各国各地区最为了解的国家。当时中国有关东北亚各国各地区的记载，至今还是研究这些地区的重要史料，其价值甚至超过他们本国的史料。

近代以来，中国经济、文化的发展落后了，东北亚一些国家和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超过了我们。这些年来，反过来是这些国家和地区影响着我国经济、文化的发展，与此同时，我们对东北亚各国各地区的了解也落后了。有一段时间，不仅我们对东北亚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了解、研究落后于他们本国，甚至我们对自身的了解、研究也落后于东北亚某些国家。这种落后与我们长期的闭关自守是分不开的。

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中国又再次加强了和东北亚各国的经济文化交流。但是中国在东北亚应有的地位还未完全恢复。我们并不想恢复中国在汉唐时对东北亚的统治地位，我们只指望和东北亚各国建立平等互利的交往，在东北亚事务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但要做到这些，一方面必须促进我国经济文化的发展，迎头赶上东北亚的先进国家和地区；一方面必须加强对东北亚各国的了解和研究，这两者又是互相联系的。只有促进我国经济、文化的发展，才能为我们更多了解东北亚各国奠定物质基础。也只有加强了对东北亚各国的了解和研究，才能更好向各国学

习,以促进我国经济文化的发展。也只有加强对东北亚各国的了解和研究,才能知己知彼,更好地和东北亚各国联系交往。

长期以来,学术界有一种认识,总认为我们在研究东北亚各国时必然落后于他们本国,我们拿不出什么有价值的成果。但是对任何问题的看法,都有一定的立场观点,各国各自有不同的立场观点。今天中国在东北亚事务中日益起着更重要的作用。这就要求中国人站在自己的立场观点来重新认识东北亚的历史和现实,而不是照搬别人的观点,东北亚各国也有必要认真了解研究中国人对东北亚问题的立场观点。没有彼此间新的认识为基础,要建立东北亚和中国的新的关系是很困难的。

因此,我们早就决心加强对东北亚各国政治、经济、文化的历史和现状的研究,决心把我国东北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放在东北亚各国总的发展中来重新认识,决心研究我们在历史上和东北亚各国的交往和所起的作用,并进而研究我们和东北亚各国的关系及应承担的责任。

我们决心系统整理总结我国学者对东北亚的研究成果。弄清我们对东北亚究竟知道多少,不知道多少;过去哪些看法是正确的,哪些看法是需要改进的。也要让国外学者知道中国人对东北亚各方面问题有我们的立场观点,必须了解和尊重我们的观点,我们不会再让别人歪曲和篡改历史,任意摆布我们。我们要用我们的学术成果让大家知道,我们已准备好和各国学者在学术上交流与争鸣。这就是我们编这套书的宗旨。

我们力求在本书中全面反映我国学者对东北亚各国政治、经济、文化的历史和现状的观点,但由于编者的水平有限和一些客观上的困难,可能一时还实现不了我们的想法,但我们有决心再接再厉,最终一定实现我们的宗旨。

孙进己

一九九四年十二月



作者近照

卢明辉，生于1934年12月20日。祖籍山西省山阴县。1964年毕业于内蒙古党校理论研究班，毕业后分配到内蒙古历史研究所，任近现代史研究室主任，1979年任内蒙古社会科学院蒙古研究所副所长，先后任副研究员、研究员。主编、合编《陶克陶胡史料集》、《蒙古族历史人物论集》、《蒙古史研究论文集》、《中国蒙古学会成立大会纪念集刊》、《中国蒙古史学会论文集》等资料、论文集多部，著有《蒙古“自治运动”始末》、《中国北方民族关系史》、《中俄边境贸易的起源与沿革》、《清代蒙古史》等专著多部，发表论文数十篇。

前言

从历史地理学的角度概观,位于中亚和东北亚的我国北疆蒙古高原,以大漠为中心的旷野地带,是丘陵起伏干燥、半干燥的内陆天然牧场。这里既有一望无际的辽阔草原,也有峰峦重叠的原始森林,以及部分湖泊、河流。自古以来,就是我国北方诸民族从事游牧、狩猎和繁衍、生息的地域。他们为围猎野生动物,或觅寻水草丰盛的良好牧场,经年在高山峻岭间和黄沙、白雪中熬炼奔驰。由于这种经常处于迁徙不定的游离状态的生活,人和牲畜完全仰赖于大自然,并应顺于季节循环而辗转游牧(狩猎)的生产方式,造就了北方游牧(狩猎)民族所特有的强悍而勇猛的“骑马民族”性格。但是,这种“逐水草而居”或为了追逐野兽,觅寻良好牧场,随季节而移动的生产活动,往往受到自然地理环境和传统粗放游牧(狩猎)业自然经济基础的制约,在其日常的生产和生活中,所必需的一部分生产资料和粮食、布帛等生活用品,只能依赖与其地理毗连的中原内地从事农耕生产的定居民族地区取得补充。所以,几千年来,我国北方从事游牧(狩猎)业的民族和中原内地从事农耕业的民族,形成了两种不同经济类型的民族,而且在经济、文化方面,始终保持着“千丝万缕”的密切关系。

在历史上,北方诸游牧民族与中原内地农耕定居的华夏、汉族,由于各自的社会、经济、政治等不同,汇合而成了长城内外的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两大民族集团。长期以来,这两大民族集团之间,保持着你来我去、我来你去的频繁接触,形成了相互依存、共同发展、谁也离不开谁的向心凝聚力;同时,在北方游牧民族封建(奴隶)主与中原王朝的封建统治者之间,不断发生冲突,在政治上也产生过民族歧视和压迫,造成游牧民族与农耕定居民族之间的相互排斥与隔阂。

始自商周和春秋战国之时,北方的猃狁、荤粥等诸戎狄不断内迁,形成“夷蛮戎狄,犹错处内地”与华夏、汉族犬牙错居的局面。至秦汉、隋唐之际,匈奴、柔然、突厥等诸游牧民族,相继南下。降至五代、宋、元、明、清以来,鲜卑、契丹、女真、蒙古、满族都曾先后进入中原内地,有的还建立过统辖半壁河山的王朝政权,其中蒙古和满族的统治者所创建的全国大统一的封建帝国,为发展中华民族统一多民族的大家庭格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每个民族都不是长期稳定的人们共同体,而是在历史过程中不断发展变化的民族实体。北方诸游牧民族与中原农耕民族,经过不断流动、混杂、分合以及北方诸游牧民族多次

向中原地区渗入,中原地区华夏、汉族不断地向周边民族地区扩散辐射,形成了中华民族的大混杂和大融合的多元一体的凝聚核心。这期间北方诸游牧民族与中原农耕民族之间,既存在着“各个层次的多元关系,又存在着分分合合的动态和分而未裂、融而未合的多种情状”,“形成一个你来我去,我来你去,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而又各具个性的多元统一体。”^①正是在这种多元一体的格局中,各民族之间不断相互吸收对方的优秀文化,而又不失其本民族的个性,分别创造出各具特色的民族文化。从而为国内外民族学和民族史研究者们,提供了最富有吸引力的研究课题。

本书是我 30 余年来从事北方民族史研究,探索以清代为主的北方民族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和人物活动等的成果的一部分,就其内容来看,主要是对北方游牧民族在悠久的历史长河中的嬗变和发展轨迹的一些探索性研究。敬祈专家、读者的指教与匡正。

① 费孝通:《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

目 录

前 言	(1)
第一编 北方民族关系史研究	
一 我国古代北方游牧民族之间及其与中原汉族的关系	(3)
二 “草原丝绸之路”与内亚蒙古社会近代文明	(18)
三 清代北方各民族与汉族之间的文化科技交流	(30)
四 清代蒙古地区与中原地区的经济贸易关系	(42)
五 清代达斡尔、鄂温克族等与中原汉族的经济贸易关系	(52)
第二编 清代蒙古地区经济研究	
一 清代蒙古地区畜牧经济的变化	(57)
二 清代漠南蒙古地区垦植农业发展与土地关系的嬗变	(65)
三 清末札萨克图旗土地放垦及演变情况	(80)
四 从“走西口”、“闯关东”看清代内蒙古的农业、手工业发展	(94)
五 近代蒙古社会经济变化的几个问题	(100)
第三编 清代对蒙政策研究	
一 清初满族统治者对蒙、汉的政策	(111)
二 清初对北方边疆少数民族的安抚政策	(118)
三 清政府对蒙古“封禁政策”与旅蒙商的作用	(122)
四 清末“移民实边”对蒙古社会的影响	(127)
五 清政府治蒙政策及其对近代蒙古社会经济变化的影响	(134)
第四编 清代蒙古民族运动研究	
一 清代内蒙古地区的“独贵龙”运动	(147)
二 同治年间西北回民起义对蒙古地区反封建斗争的巨大影响	(150)
三 近代蒙古社会状况及清末“民族运动”的几个问题	(158)
四 辛亥革命与蒙古地区的“民族运动”	(178)
第五编 中俄边境贸易研究	
一 清代前期中俄边境贸易及其对北方民族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	(191)
二 恰克图买卖城中俄边境贸易的兴衰变化	(203)

三	对扩大发展内蒙古与苏蒙边境贸易的几个问题及其对策的探讨·····	(212)
第六编	德王与“西蒙古自治”	
一	德穆楚克栋鲁普传略·····	(221)
二	三娘孙氏对德王的精心抚养·····	(230)
三	德王在呼和浩特会见蒋介石·····	(232)
四	不甘雌伏 北平三年的隐居 ·····	(254)
五	东山再起 “西蒙自治”的酝酿 ·····	(265)
六	重建武装 德王等赴广州请愿 ·····	(272)
七	东拼西凑 成立“蒙古自治政府” ·····	(283)
八	失败告终 “蒙古自治”分裂和溃灭 ·····	(295)
第七编	蒙古人物研究	
一	蒙古族代表人物的反侵略斗争·····	(303)
二	陶克陶胡·····	(308)
三	巴布扎布传记·····	(311)
四	嘎达梅林反垦斗争事略·····	(315)
第八编	内蒙古史地研究	
一	内蒙古的山河风貌与民族演变·····	(321)
二	赵武灵王与赵长城·····	(325)
三	百灵庙散记·····	(328)
四	鄂尔多斯的历史变迁·····	(332)
	作者自传·····	(335)

第 一 编

北方民族关系史研究

一 我国古代北方游牧民族之间 及其与中原汉族的关系

在我国北方辽阔、富饶的蒙古高原地区，从遥远的古代起，就是许多从事渔猎、游牧民族劳动、生息、繁衍的地方。这些民族崛起、形成和出现在历史舞台上的时间虽然有早有晚。但是，他们对中国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北部辽阔疆域的奠定，对缔造中国各民族光辉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对推动中华民族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进步，都产生过巨大的影响。

(一)

在我国北方边疆地区，遍布着许多古代文化遗址，据近年来在内蒙古考古发掘的大窑（呼和浩特市郊）、大口（伊克昭盟）、札赉诺尔（呼伦贝尔盟）、白泥窑子（乌兰察布盟）、阿善（包头市郊）和红山、富河（昭乌达盟西刺木伦河流域）等地，许多文化遗址和古代文献记载，从旧石器时代到新石器时代的原始社会起，北方民族的先民，就在这里生息、繁衍、发展，他们过着浪漫而富于冒险性的生活，在辽阔的草原上，逐猎羚羊、野驴、野马、赤鹿等动物。当猎获物有了盈余的时候，渐渐学会驯养，经济生活便由狩猎逐渐演变为养殖羊、马、牛、鹿、驼的游牧业。在一些“土宜五谷”生长的地区，也有部分粗犷的锄耕农业。从河套人头骨化石到札赉诺尔人颅骨化石的发现，以及从遍布蒙古高原的古文化遗址中出土的骨针、骨镞、骨锥、骨铲、骨刀、骨饰和动物的遗骨骼，都充分证明远在远古时期，北方民族的祖先就采集、狩猎在这个地区。在一些遗址中还出土有石铲、石斧、石刀、石磨盘等生产工具和贮存谷物的钵、罐、盆、瓮之类陶制器皿和各种装饰品，这些包含着新石器时代遗存的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品，在器形、制法、质地、装饰风格和彩绘图案等各方面，都表明它与黄河流域中原文化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此外，在外蒙古境内的杭爱山脉中楚鲁腾河流域、阿尔泰山脉中的科布多地区以及内蒙古阴山山脉分布在巴彦淖尔、阿拉善、乌兰察布境内，还有在昭乌达盟克什克腾旗岔河流域等地发现的古代岩画中所绘的围猎、牲畜和车辆等图像，也充分反映出远古时代北方民族从事狩猎、游牧兼有锄耕农业基本特色的侧面写照。

商代是我国奴隶社会古代文明高度发展的时期，在昭乌达盟奈曼、库伦旗和哲里木盟

科左后旗发现的夏家店下层文化遗址中,出土的铜矛和环首铜削刀等青铜器,同样表明中原古代灿烂青铜文化对这里的直接影响。

商代后期,獯鬻、鬼方、玁狁诸北方民族^①先民共同体,势渐强大,曾屡次出没于中原的丰镐以西和以北地区。据《易·既济》辞曰:“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可见那时鬼方的势力已很强大,他们与中原诸夏族的关系是源远流长极为密切的。有些当时被泛称为戎、狄的游牧民族先民,还星罗棋布在今河北、河南、山西、陕西、甘肃等黄河流域地区,与华夏族错居,相互有着密切交往和联系。春秋时,“夷蛮戎狄,犹错处内地”^②,相互依存关系更为密切。晋国大夫魏绛曾向晋悼公进言,联合晋国附近的北方游牧民族,认为“和戎有互利”。晋悼公采纳了他的意见,曾“使魏绛盟诸戎”。^③又据《国语·周语》记载,周成王时伐鬼方,穆王攻犬戎(泛指北方游牧民族先民),俘其五王,迁其部落若干于汾洮太原一带(今山西北部与内蒙古河套地区)。至厉王末年,玁狁乘周室内乱,深入王畿,迫近镐京。《诗经·小雅》篇《采薇》中说:“采薇采薇,薇亦作止,曰归曰归,步亦暮止。靡室靡家,玁狁之故,不遑启居,玁狁之故……”从这些反映出征玁狁将士们思念家乡的述怀诗篇中,充分说明早在周代,北方诸游牧民族就不断南迁,同中原华夏保持着血肉相连的关系。例如公元前771年(周幽十一年)幽王因宠褒姒,废王后及太子,嗣王后、太子出奔于申,幽王举兵伐申,申侯求助于犬戎。于是,犬戎攻陷镐京,追杀幽王于骊山下,占领渭水流域,足见当时犬戎在北方的力量是很强大的。

东周时,一部分戎、狄北方民族有:分布于河北和山西一带的“赤狄”,陕西北部和河北藁城、晋县等地的“白狄”,都城洛邑(今河南洛阳)附近的陆渾之戎和伊雒之戎。这些戎、狄长期活动于齐、卫、晋、鲁、邢、宋、郑、周诸国之间,他们多次侵扰这些小国,其中以卫国受狄攻击最甚,曾两次被迫迁都,由朝歌(今河南淇县东北)迁楚丘(今河南滑县东),再迁帝丘(今河南濮阳)。这些深入到中原地区的戎、狄,是靠近内地发展比较进步的部分北方民族先民。此外还有许多分布在较远的“北蛮”荒原地区,但当时未能见于史册的记载。

战国以后,北方诸戎、狄的名称,多不再见记载,并不是说这些民族完全消失了,而是由于在长期发展过程中,这些北方民族为争夺牧场、狩猎区不断发生非常频繁激烈的攻伐战争,从而使得一些较为弱小的部落为强大的民族所兼并、吸收、融合,逐渐演变成为几个较大的民族(或部落联盟)。也还有许多的戎、狄,由于不断内迁中原内地定居,经过长期发展变迁,大都与华夏融合为一体。王国维在《观堂集林》中谈到北方诸游牧民族的称谓变化时说:“随时而异,因地殊号,至于后世,或者以丑名加之。其见于商、周间者,曰鬼方、曰昆夷、曰獯鬻,其在宗周之季,则曰玁狁;入春秋后,则始谓之戎,继号曰狄;战国以降,又称之曰胡,曰匈奴。”当然,历史上北方游牧民族的发展变化,并不单纯是各个时期的名称不同问题。无论是鬼方、昆夷、獯鬻、玁狁也罢,戎、狄、胡、匈奴也罢,都是当时中原华夏人对北方诸游牧民族的称呼。实际上他们在内部的称谓上,是有许多族、支的分别,但多未见于史册,为我们所不知。

① 氏族、部族、部落、部落联盟、民族等在民族学上都有不同概念,限于篇幅和资料,本文不拟探讨这些民族学上的理论问题,故将北方民族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人们共同体,统称为“族”。

② (清)顾栋高:《春秋大事表》,《皇清经解汇编》。

③ 《左传·襄公四年》。

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当一些新的民族出现并取代原有一些民族或部族时,往往构成民族间发生激烈战争的因素。这种斗争动乱,扩而大之,或兼并、吸收其他民族的成员,或若干民族联合一起形成新民族,取代在这个历史舞台上的旧有民族。例如战国时期,活动在燕、赵、秦以北地区的匈奴、东胡诸族,就是经过数百年来不断吸收、合并戎、狄诸族人口而发展壮大起来的。而这种互为依存、交错发展的族属关系,不是在短暂的、简单的自然发展过程中形成的。考察我国北方各民族的发展史,在地缘、族属、语言、俗习互有差异的民族之间,进行取代或变替,往往要经过长期而激烈的带有民族斗争性质的争夺战争。北方民族是活动力很强而生活飘忽不定的马上民族,他们经年在高山峻岭黄沙白雪中熬炼奔驰,从事着粗犷而富有冒险性的游牧狩猎生产活动。由于他们日常生活中所需的衣食住行完全依赖于畜牧或狩猎,他们的财富以牲畜或猎获野生动物的多寡计算,牲畜与他们的生存有着直接的、不可分割的关系,所以,为了寻找水草丰美的牧场,经常远离住地,到无拘无束的自由天地去过悠哉游哉的游牧狩猎生活。早在约 3000 多年前发生的亚欧大陆草原地带民族大迁徙,亦充分反映了游牧民族的动因。同时,这些民族的统治阶级,为了满足私利适应本民族游牧生产的发展,常常借发动侵伐他族战争的手段来达到掠夺控制其他民族财富和人口的目的。这在当时的民族关系上,是个十分复杂而充满矛盾的历史过程,它给各民族人民带来了严重的灾难。对于历史上北方游牧民族之间的这一突出特点,我们不能单纯从相互掳掠、挾伐的消极方面去认识。恩格斯曾指出:“一切重要历史事件的终极原因和伟大动力是社会的经济发展,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改变,由此产生的社会之划分为不同的阶级,以及这些阶级彼此之间的斗争。”^① 这就是说,社会经济是各民族发展的共同基础,因此,对历史上诸游牧民族之间矛盾、纷争的基本原因,必须从各民族当时的生产方式和经济发展状况中去探求。然而,这也并不否认,从宏观方面看,在一定意义上讲,历史上各民族之间的战争起着促使不同民族相互融化的催化剂作用。

(二)

我国古代的北方民族占据着蒙古高原到中亚内陆的干燥地区,这一带由山麓、沙漠、丘陵和众多湖泊、江河构成富饶辽阔的大草原,可供自由放牧大量的牛马羊畜群,并可随季节为觅求良好的牧场而移动游牧。这种逐水草而迁徙、随季节而游牧的生产方式决定了他们的人口和牲畜都经常处于游离状态,是在“动”的基础上来求得生存和发展的,故被称为是人畜并重、人随畜迁的“行国”。同时,这种完全仰赖大自然而顺应季节循环进行辗转谋生的生产方式,也造就了从小“儿能骑羊,引弓射鸟鼠。少长,则射狐兔,肉食,士力能弯弓,尽为甲骑。其俗,宽则随畜,因射禽兽为生业;急则,人习战攻侵伐,……利则进,不利则退”^② 的强悍勇猛的“骑马民族”性格。由于上述生产方式和生活环境的制约,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倘若把一个民族孤立地隔绝在一块固定地域内,是不可能生存和发展的。这从客

^① 《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

^② 《史记·匈奴列传》。

观上使得古代游牧、狩猎民族对于地界的观念和战争目的认识,同农耕社会定居民族截然不同;事实上,游牧民族(或部落)之间虽亦“各有分地”,但在地域上并不存在明显的分界线,为另辟蹊径而迁徙转移牧地,常常是造成民族或部落之间发生战争的因素之一。

在久远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从各民族之间互相倾轧厮杀的战场,变成民族融合的大熔炉。游牧民族长期互相侵伐、纷争的结果,使一些民族溃败衰弱了,被迫退出原先占据的地区,其归宿往往是一部分人口迁走他乡,另一部分剩下的人口和财产被战胜者掳掠,纳入自己行列。当然必须看到,各民族之间通过频繁的接触或战争,打开了各自封闭的壁垒,沟通并不断丰富彼此的语言和文化,从而形成不同民族(或部落)之间在血缘和地缘上的结合,造成彼此人口混合、融化,进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使那些不同语族、血系的自然民族(或部落)转化为与其他民族混同融合的新民族。例如在历史上具有显赫声威的匈奴、东胡(其后的鲜卑、柔然、突厥、契丹、女真、党项、蒙古、满等)族的形成,就是承袭山戎、北狄诸游牧狩猎民族,从血缘、语族、地域上不断互为渗透、吸收、融化结合而成的新的联合体。至于早已固定下来的中原的华夏、汉族,更是长期以来混杂融合各少数民族血缘而结合成的民族共同体。

从经济形态方面来看,北方游牧民族日常生产和生活所需的铁制工具、谷物、布匹和工艺品等,都是处于流动性较大的游牧社会所无法生产的。为此,北方游牧民族必须与中原农耕社会汉族建立“愿以所有,易其所无”的密切交流关系。但是,在阶级社会中,各民族之间的关系不可能都是牧歌式的友好往来,由于各族统治阶级的暴虐,各民族之间也存在着矛盾和斗争,有过火与血的交锋。秦汉初期,匈奴取代山戎、北狄诸族,发展成为势力强大的民族,并建立起奴隶制的游牧民族军事政权。以阴山和河套地区为大本营,凭借“骑马民族”在军事上灵活主动的有利地位,对中原处于分裂割据的汉族统治政权,乘虚而入。经常出没在今河北、山西、陕西、甘肃北部一带,伺机对燕、赵、秦诸国北部边城发动武装攻掠,进行掳掠骚扰。《史记·赵世家》载:赵武灵王提出实行“胡服骑射”的主张,就是采用胡人特长来制服匈奴等“胡人”的决策。他为了学习北方游牧民族的骑射本领,建立自己的骑兵武装力量,多次下令诏谕全国脱掉长裙拖地的裘裳“国服”,穿上短衣露袴的胡服,以利于学习掌握胡人精湛灵活的骑射战术,击破匈奴的武装骚扰活动。以后,又“北破林胡、楼烦、筑长城,自代并阴山下,至高阙为塞”。^①燕国大将秦开,曾被“质”在东胡,甚得胡人的信任,熟习东胡的情况,返回燕国后,以学得胡人的骑射特长整饬训练劲旅,率大军击败东胡,拓展土地千余里。“秦昭王时,义渠戎王与宣太后乱,有二子,宣太后诈而杀义渠戎王于甘泉,遂起兵发残义渠,自是秦有陇西北地、上郡,筑长城以拒胡”。^②秦始皇兼并六国,统一中原后,派大将蒙恬率兵30万北击匈奴,夺“河南地”(今内蒙古河套、鄂尔多斯一带)。从此“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士不敢弯弓而报怨”。^③为巩固北部边防,在燕、赵、秦长城基础上,“因地利,用险制塞,起临洮,至辽东延袤万余里”^④重新修筑长城,派名将精卒戍边坚守,以拒北方诸游牧民族的侵扰。

① 《史记·匈奴列传》。

② 同上。

③ 贾谊:《过秦论》。

④ 《史记·蒙恬列传》。